

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张鸿雁教授,对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已经研究了有9年之久。谈到城市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问题,他的观点是只有加快城市化,才能解决这些问题;从精神层面上讲,无论是城市的原有居民,还是外来人,目前都挣扎于“拔根”与“扎根”之间,只有把根扎下去,才是解决种种心理压力的根本之道。

房价太高,无以为家;频频跳槽,缺少归属感——

让人扎下根来才能化解城市病



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张鸿雁

大城市病是因为中小城市病更重

“大城市病这个概念其实是个伪命题!”接受记者采访,张鸿雁开篇就语出惊人。

“大城市生病,还不是因为中小城市病得更重。比如大城市有好的教育资源,有一流的医疗条件,对事业来说有更多的发展机会……而这些正是中小城市所欠缺或不足的。不然,为什么大家一边抱怨着大城市病,一边又拼命往大城市挤呢?”因此,张鸿雁认为,其实不是城市大了才产生这些问题,而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。

在高速发展的城市化中,既存在着整体的共性问题,也存在着个性化的城市问题,共性问题是世界性的,全世界范围内无论哪类城市,都存在这样几类共性问题:就业问题、污染问题、土地问题、城市犯罪问题、老龄化问题、交通拥挤问题、社会保障和住房问题等。

另外,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同,城市又存在着个性的问题,特别是中国在某方面表现得极为鲜明,这首先是中

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差异过大造成的。中国的城市化率是50%,但各个城市的城市化率不一样。如上海城市化人口已经超过70%,深圳接近100%;而江苏的苏北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几,贵州某些地区城市化水平更低。有的城市资源充分,有的资源严重缺乏;有的城市是工业城市,污染严重,有的城市传统建筑受到建设性破坏等。由于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,每个城市突显的问题排序有所不同,因此对不同城市发展中的问题,应该有不同的对策和理解方式。不能全国一刀切,一个城市有病,全国跟着吃药。

规划滞后,老是被现实超越破解

城市为何会产生这么多的毛病,张鸿雁认为,首先就是规划的超前性落后,滞后于发展,总是一次次被超越、破解、不利用。无论是北京、上海还是南京,都有这个问题。政策和城市发展战略上,都明显地滞后于城市化的发展。如土地政策、人口政策、就业政策、住房政策、城市改造政策、能源开发政策等都大大滞后于城市化的发展。举个最常见例子,现在

私家车呈现爆发式增长,原本还觉得挺宽敞的道路,一下子就变得拥堵不堪,究其原因,道路设计时车辆还不多,没有考虑到发展会如此迅猛。

城市化过快,带来了一些问题。特别是在大城市中,部分病症可能会表现得更为突出。然而要解决这些,还得依靠加快城市化,进一步完善城市里的各项体系。

“而地方政府为了利益,往往与中央提出的整体发展目标存在错位、博弈现象。”张鸿雁说,例如中央提出城市应当发展公交优先模式,但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,却更乐于推动汽车经济;中央要求严格控制房价,地方为了土地财政,落实起来就大打折扣。

尊重大众,改变大城市的无根状态

“短短几十年间,我们从传统的农业社会,跨越式地进入到城市主导的现代社会。无论是城市的原有居民,还是外来人,都挣扎于‘拔根’与‘扎根’之间。”张鸿雁说,目前很多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,处于无根状态,面对高房价,无以为家,没有归属感;频频跳槽,一次次被“拔根”……所

以,扎根是解决病症的根本。

在制度型保障体系没有健全,人们经常性处在压力中,会普遍存在对生活的恐慌、对环境的厌倦、对现实的急躁和对未来的无名担心。所谓“逃离大城市”、“厌世情绪”、“生活自闭”、“宅男宅女”、“强迫工作”、“心理忧郁”、“群体焦虑”、“交通拥堵恐惧症”、“住房还贷综合征”、“手机综合征”、“网瘾”、“宠物综合征”、“空调综合征”、“电视综合征”以及“狂人文化”、“匪气文化”、“伪娘文化”等,都与都市转型中的“紧张因素”有关。

要有效治理这些病,让人们得以在灵魂上“扎根”于这个时代和城市,就必须提供较充分的就业机会、适宜安居的环境、医疗社会保障、良性公平竞争机会和积极向上的利他主义文化氛围。首先,要让每一个人都尊重和被尊重,才能使人们产生认同感,例如公交优先,这就是大众被尊重的表现;其次,满足基本住房要求,要让每个人在城市有家;同时需要创造完整的社会福利与公平竞争体系,通过营造公平的发展和分配氛围,以此来重塑个体尊严与价值。

快报记者 孙兰兰

»对话

大城市病的解药是城镇化



乔新生

星期柒新闻周刊:乔老师,现在流行的大城市病,相信你也有所感受吧,比如说很多人都在喊“逃离北(北京)上(上海)广(广州)”。

乔新生(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):是的,我现在住的地方,就在市中心,楼下很吵,空气也不好,有时候出门打车也打不到。上次我去上海出差,从浦东到浦西,整整花了一个半小时,在大城市生活,有时候确实挺累的。年轻人在大城市生活,扛不住压力而离开,很正常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现在很多人说,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遭遇各种各样的大城市病,是必须经历的过程,是成长的代价,你认同这种观点吗?

乔新生: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对,发展过程中很多的大城市病,完全是可以避免的。关键是城市规划有没有预见性和稳定性,是不是以人为本。

我们现在的城市规划问题很多,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,就是长官意志太浓,行政主导

城市规划。很多时候,往往是领导头脑一发热,手一挥,一个规划方案就匆匆忙忙出炉了,它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有多少呢?经常是没人去管。等这个规划实施一半了,领导觉得这样搞不行,就立马换了个方向。很多大城市的规划朝令夕改,老百姓被折腾得不行,这都是行政主导的结果。很多时候,官员们要的是政绩,往往见物不见人,如果规划不能去除长官意识的话,就没什么科学性可言。

比如说大城市病中最典型的交通拥堵问题,有的情况是完全可以避免的。我们这边现在的城市格局,是以北京为代表的“摊大饼模式”,一环二环三环,这样一环一环摊出去,搞到后来,北京成了“首堵”。其实现代城市的空间概念是立体化,而不是平摊化,规划者首先应该考虑如何疏散人流。如果北京不是摊大饼,而是像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一样搞中心辐射的模式,拥堵就不会这么严重了。

顺便说一些伦敦的交通拥堵费问题,人家伦敦人觉得中心城区太堵,空气也太差,所以收取拥堵费缓解车流,这当然是经过充分协商的。我们这边很多城市也说要收拥堵费,收费当然可以,但关键是要经过充分讨论,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。

再比如环境污染问题,无论是河道污染还是空气污染,也都是可以避免的,关键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能不能解决好基础设施建设问题,比如说完善雨污分流,拒绝化工企业等等。说到底,还是城市能不能从人的角度来发展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我们一直在提

“城市化进程”,很多地方也都声称要打造“国际化大都市”,城市规模越来越大,甚至出现了比谁高楼多,比谁城区面积大这样的竞赛。在你看来,越来越严重的大城市病是不是该让我们反思“城市化”的正确性。

乔新生: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,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径至关重要。我的看法是,我国合理发展模式是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。事实上,决策层已经对这一问题有清醒的认识,推行城镇化建设的力度也越来越大。说到底,选择城市化还是城镇化,是一个公共资源配置的问题。你想想,如果大多数人口都聚集在沿海的几个特大型城市,教育、卫生等公共资源也都集中配置在这些城市,这样的发展必然就是极不均衡的,也是很不稳定的。解决目前的大城市病问题,均衡资源是关键,城镇化是出路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有什么具体建议吗?

乔新生: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,城镇化有两种比较成熟的模式。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“卫星城模式”,一个大城市辐射周边,形成一批卫星城,通过地铁轻轨等公共交通工具连接在一起。另一模式是芬兰、挪威等国为代表的“散点布局模式”,没有什么特大型城市,都是规模适中的中小城市。

我国人口多,现在也已经形成了一些大型城市,“散点布局模式”不适合我们,所以应该多学学德国的“卫星城模式”,实际上,现在一些地方已经有了这样的思路,比如一些地方提出的一小时都市

圈概念,就是这样。但说到底,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公共资源能不能重新分配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,代表优质教育资源的大学,能不能从大城市移到周边的小城镇去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你是希望大学带动小城镇的发展?

乔新生:不错,我一直认为,大学应该设立在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上,这跟现在在很多地方搞的大学城不是一个概念,因为大学城基本上都还是在城区里的。

大学来到小城镇,一方面可以带来人才优势,另一方面可以加快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,更重要的是,能够起到极强的消费拉动作用。其实世界上很多名校,都不是在大城市里的,比如说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,都是在小城镇上,这也没妨碍人家成为世界一流大学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如果你任教的大学搬到小城镇上,你会习惯小城镇的生活吗?

乔新生:如果公共交通发达,能够很方便地把小城镇与大城市连接起来的话,在小城镇生活工作有什么不好呢?这里空气更新鲜,也更安静,视野也更开阔。

当然,小城镇的发展不光是靠大学搬过来,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把更多的资源分配到小城镇建设上来。比如说,基本设施的完善就很重要。我一直在想,如果规定外来工在某个大城市创造的GDP中的1/10能拿出来支持其家乡的小城镇建设,那会怎么样?也许过了若干年,人们就会乐于回到这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小城镇了吧。

快报记者 赵勇

»他山之石

东京:以人为本

居民人口超过千万的东京,与其他大城市一样,塔楼高耸,大厦林立。然而,就在城市中心区里,古老的低矮木屋、狭窄的曲径小巷、热闹的集市货摊却奇迹般地保存至今。正是在这样的街区中,日本人最为传统的生活方式得以延续。不同于其他西方城市的线性城市规划结构,在东京,很多林荫大道是沿着富士山和筑波山的自然地势而修建的。显然,东京的城市规划者们所看重的,是行人而不是汽车,是与自然协调而不是对立。

莫斯科:中心放射

1935年,莫斯科重建计划在建筑师阿尔卡季·莫尔德维诺夫的主持下启动,其中心部分——克里姆林宫及红场是城市的“心脏”,由此向外延伸的一条条放射状大道形成了城市中心的特殊布局。但是,放射状城市也有缺陷,所有道路都要穿过市中心,容易造成交通拥堵。为了缓解这一矛盾,上世纪60年代,莫斯科重新调整城市布局,把单中心格局逐步调整为多中心。

纽约:棋盘布局

整个纽约呈棋盘状布局,共分五个区。曼哈顿为市中心区,著名的金融中心华尔街、娱乐区百老汇等均位于此区。纽约市摩天大楼林立,其中有很多世界知名的建筑物。进入新世纪,纽约开始策划在远离曼哈顿的泽西市建立一个新的商业中心,将其作为曼哈顿的延伸,以达到分散就业,减轻市中心区压力的目的。